

中东欧国家周报

【克罗地亚政治周报】

克国法院新禁令对其新闻自由构成新挑战

Samuel Hodman

(2021年10月)

Kiadó: Kína-KKE Intézet Nonprofit Kft.

Szerkesztésért felelős személy: Chen Xin

Kiadásért felelős személy: Feng Zhongping



【克罗地亚】克国法院新禁令对其新闻自由构成新挑战

概要

9月，克罗地亚法院对一家克罗地亚媒体集团发布了一项前所未有的禁令，禁止其再对一家公共福利机构及其负责人进行报道。克国国内长期存在新闻媒体自由问题，这起事件是关于这个主题的最新案例。克罗地亚媒体协会(Croatian media associations)在过去几年中始终对相关政策表示反对，欧盟也将这一问题列入了2021年的立法议程(legislative agenda)。尽管如此，在过去的十年中，新闻自由在法律和社会层面面临的挑战已然变得司空见惯。

引言：《H-alter》案例

最近，克罗地亚记者耶莱娜-金德拉(Jelena Jindra)在网络报纸《H-alter》上发表了数篇题为《是保护儿童还是虐待儿童的系统?》(System for Protection or Abuse of Children?)的长篇批评文章”。这些文章都

由五部分组成，主要内容涉及克罗地亚国内有关儿童保护和父母权利的调查情况。

这些长篇调查性文章是学术研究型文章，采访了很多母亲，调查了有关儿童因父母其中一方的某些行为致使孩子与另一方产生隔阂的案例。金德拉还深入分析了萨格勒布儿童和青年保护综合诊所 (Children and Youth Protection Polyclinic) 的工作，该社会福利机构为遭受创伤的儿童及其家庭（即受虐待和被忽视的儿童，受战争影响的儿童）提供支持。但是，她在文中对该诊所主任戈达娜·布尔扬·弗兰德 (Gordana Buljan Flander) 的工作及其任期表达了批评意见¹。

作为一名记者，金德拉在发表文章之前严格遵循新闻程序，多次表示希望弗兰德和综合诊所对此予以回应，但都以失败告终。此后，这些文章最终于9月在《H-alter》网站上发表了。然而，文章一经发表，弗兰德和综合诊所立即对《H-alter》及其出版商独立媒体文化协会 (AIMC) 提起了诉讼。法院在没有听取金德拉、《H-alter》的主编或出版商代表说明真相的情况下对金德拉的新闻工作进行了评估。法院决定对《H-alter》和独立媒体文化协会下达临时禁令，禁止其发表任何关于弗兰德主任或儿童和青少年

¹<https://www.mappingmediafreedom.org/country-profiles/croatia/>

保护综合诊所的文章²。与通常基于诽谤或“羞辱”的禁令不同，这一决定是基于《执行法(Enforcement Act)》而做出的，通常情况下《执行法》只适用于侵犯隐私的媒体内容。

这也意味着，克罗地亚法院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行动，直接禁止发布有关某一机构或个人的任何事情。两天后，弗兰德宣布从其诊所辞职。她担任主任期间出现的丑闻和法院对《H-alter》的裁决在政治领域内掀起波澜。克罗地亚记者协会(Croatian Journalists' Association, CJA)和克罗地亚记者工会(Trade Union of Croatian Journalists, TUCJ)谴责法院压制媒体的做法是一次危险尝试，且难以接受³。

克罗地亚新闻界面临的挑战

虽然有关《H-alter》案件的审查风格和程度未曾有过，但这只是克罗地亚限制新闻自由的一起最新案例。诽谤是一种刑事犯罪，侮辱共和国及其象征物会被判入狱，而且自2013年以来，对个人进行“侮辱”的媒体内容也已被定为刑事犯罪。至关重要的是，法院对什么是诽谤、羞

²<https://www.hnd.hr/eng/tucj-and-cja-system-for-systematic-abuse-of-journalists>

³ ibid.

辱或侮辱共和国的行为有着最终解释权。克罗地亚地方法院通常很容易地提起针对记者和出版商的诉讼⁴。

上述情况导致了克罗地亚“反对公众参与的战略诉讼”（SLAPP, strategic lawsuit against public participation）的使用。SLAPP 诉讼主要是指公职人员就有关他们及其机构的文章（不管文章是否遵守新闻法规）提起诉讼，这类诉讼往往耗时长，费用高。早在 2020 年 5 月，“克罗地亚记者工会和克罗地亚记者协会统计了超过 905 起针对克罗地亚 18 家媒体机构和记者的未决诉讼案，原告总共要求赔偿近 6800 万库纳 (Kuna 是克罗地亚的货币-Hrvatska, HR, HRV)” 。自那之后，这一数字只增不减。截至 2021 年 7 月，克罗地亚在线报纸 Index.hr 及其记者面临着 65 起法律诉讼。其中，56 起是针对出版商的诽谤诉讼；9 起是针对特定记者的诽谤案，另外还有 3 起涉及反歧视和版权索赔。这些通常不是有关新闻渎职的技术纠纷：原告多为公众人物、政治家和企业主，主要因为一些批评性文章起诉媒体协会。例如，最近一个案例的原告是前国会议员布拉尼米尔·格拉瓦斯 (Branimir Glavaš)，他起诉克罗地亚在线报纸 Index.hr，该报纸把他称为战犯。他在奥西耶克被判犯有战争罪，在监狱服刑 5 年，他的案

⁴<https://rsf.org/en/croatia>

件于 2021 年 6 月开庭重审⁵。无论记者和出版商是否遵循职业规则，都无法避免被起诉。诉讼涉及 10,000 至 100,000 库纳的损害赔偿，克罗地亚的法律程序出了名的缓慢，年复一年要花费数千欧元的法律费用。这笔费用对媒体机构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特别是那些同时面临多起诉讼的媒体。欧洲记者联合会秘书长古铁雷斯 (European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 Gen. Secretary Gutierrez) 称，这意味着媒体在重要议题上将遭到压制。

“毫无疑问，在克罗地亚，SLAPPs 诉讼被当作是一种工具来恐吓和压制那些为公共利益而报道的新闻人和媒体，并试图借此让他们保持沉默”⁶。恶劣的法律环境使政府更易于干预公共媒体公司，迫使这些媒体公司开始在腐败等重要话题上提前对其记者进行自我审查，以避免代价高昂的诉讼。克罗地亚广播电台 (Croatian Radiotelevision, HRT) 记者抱怨说，他们被管理层压制并要接受审查。此后，广播电台一直在与克罗地亚记者协会相抗衡。

此外，克罗地亚记者常因其发布的报道而受到威胁、骚扰，甚至攻击。2021 年 7 月，记者提-帕波尼亚 (Tea

⁵<https://www.index.hr/vijesti/clanak/danas-ponovno-pocinje-sudjenje-glavas-u-od-zlocina-je-proslo-30-godina/2288292.aspx>

⁶<https://europeanjournalists.org/blog/2020/11/04/new-wave-of-slapps-hits-croatian-media-and-journalists/>

Paponja) 拍摄了一群年轻男女，他们周围站着警察。这些年轻男女正在焚烧一面骄傲旗(pride flag，它是一面象征性少数群体(LGBT)的旗帜)，帕波尼亚与他们对峙后，他们对她展开了人身攻击⁷。2020年10月，在记录萨格勒布一名疾病专家关于新冠病毒的相关采访时，克罗地亚N1电视台的一名记者和摄像师受到一对夫妇及其狗的威胁。现场情况过于紧张，直到疾病专家威胁要通过警方来处理矛盾时，这对夫妇才离开现场⁸。

记者在政界和商界也非常不受欢迎。2021年5月，克罗地亚总理安德烈-普兰科维奇(Andrej Plenković)对一名记者和新闻媒体展开了口头攻击，原因是该记者对包括克民盟在内的选举候选人持批评态度。他指责说，媒体“通过诋毁政治阵营来获利”，“是让人厌恶的雇佣兵”。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N1电视台应该写一张海报以表明该电视台的意识形态。”

如前所述，克罗地亚媒体管理部门也对记者和新闻工作充满敌意。2021年7月，《格拉斯·伊斯特尔报》(Glas Istre)的三名记者因批评该报主编和编辑政策而被公司管理层解雇。这些记者声称，该媒体对伊斯特拉民主党持有

⁷<https://www.24sata.hr/news/zapalili-lgbt-zastavu-a-nasoj-novinarki-dali-saku-u-glavu-kad-ih-je-snimala-policija-je-gledala-771765>

⁸<https://ipi.media/alerts/n1-tv-crew-insulted-and-threatened-over-protective-masks/>

社论偏见 (editorial bias)，但该党与该报主编之间仍会定期会面⁹。

由于这些原因，克罗地亚发现本国在新闻自由方面落后于欧盟其他国家。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数据，克罗地亚的新闻自由度在全球排名第 58 位，排名靠后的主要原因是撰写文章主题为腐败、有组织犯罪、战争罪行或批评政党的记者经常受到排斥和骚扰¹⁰。在国际知名数据分析公司 Statista 的新闻自由指数中，与瑞典的 7.24 和法国的 22.6 相比，克罗地亚指数为 27.95，这也就表明了其“媒体状况有问题”。

结语

法院对《H-alter》及其关于一名公职人员的批评报道下达了禁令，这只是扼杀当代克罗地亚新闻业的数百种法律和社会压力中的一种。像欧洲记者联合会 (European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 EFJ)、克罗地亚记者协会和克罗地亚记者工会这样的组织已经对诸多行为表示抗议。然而，本应保护和支​​持批判性新闻媒体（如克罗地亚 N1 电视台、Index.hr 和《H-alter》）的平台在法律、经济和社会

⁹<https://balkaninsight.com/2021/06/17/croatian-unions-back-journalists-sacked-for-criticising-newspapers-bias/>

¹⁰<https://rsf.org/en/croatia>

会层面受到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骚扰。虽然最近萨格勒布的法院禁令引起了各党派政治家对审查制度的担忧，但历史表明，一些政治家的担忧略显空洞。一些政客为了自己的利益，私下提起了数百起 SLAPP 诉讼，审查新闻并进行经济施压。政治和商业精英，甚至公众，经常公开对记者表现出敌意。由于克罗地亚公众人物受益于当前的法律环境，新闻自由取得进展的最大潜力可能来自新闻业意识觉醒，欧盟将 SLAPP 诉讼改革问题纳入其 2021 年议程。

（作者：Samuel Hodman；翻译：吴越；校对：郎加泽仁；签发：陈新）